



清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,康熙皇帝决定收复台湾,命福建总督姚启圣、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等人准备攻台之战。第二年7月,施琅率兵从铜山(今福建东山岛)出发,在澎湖大败刘国轩率领的郑军水师主力,迫使郑克塽献地投降。至此,康熙皇帝完成全国统一大业。

战争之后,康熙是如何开展善后,有效治理台湾的呢?

赐爵封官安民心

战争结束,如何处理投降的郑克塽和其他将领,是康熙面对的首要问题。为此,康熙下诏:“郑克塽家口亲族及刘国轩、冯锡范本身家口,俱令遣发来京,其伪官并明裔朱桓等,俱于附近各省上安插垦荒。”

郑克塽等人到达北京,康熙即授予郑克塽公衔,刘国轩、冯锡范伯衔,同时赐予房屋田地。对原明郑当局最高武官刘国轩,康熙更是格外关注。他命刘国轩任“直隶天津总兵官”,专门在乾清门召见刘国轩,赏赐白金、宅第。

刘国轩对康熙帝感激涕零地说道:“臣蒙皇上天高地厚之恩,无可报答,愿归身旗下,以效犬马。”

对其他官员、士卒,康熙的政策是“从优叙录,加恩安

康熙如何治理台湾

插,务令得所”,无论回原籍、受新职、入伍、归农,皆采取自愿原则,对 2000 多名官员、4 万名士卒均既往不咎、各得其所,此后再未发生叛乱。

对攻台有功之臣,康熙及时进行奖励,第一功臣当然是施琅,他被授予靖海将军,封为靖海侯。在这期间,朝廷中已有关于施琅恃功骄傲、在台湾霸占土地等议论,甚至有人建议康熙将他留在北京。

康熙清楚,台湾刚刚收复,需要施琅这样了解台湾的人镇守,将他留京,得不偿失。

他对施琅说:“有言尔恃功骄傲者,朕亦颇闻之……从来功高者,往往不克保全始终,皆由不能敬慎之故,尔其勉之。”

这番话,既有对施琅的肯定,也暗含敲打之意,让施琅感恩戴德地继续为朝廷效命。

其次,对参战的士兵,康熙破例将他们补入内地绿营。对澎湖一役伤亡的 2100 名官兵,康熙更是极为重视,要求兵部及时对伤亡官兵赐赏。

设府驻军减赋税

1684 年,清廷正式划台湾

为一府三县,隶福建省。台湾府连同厦门府一起,设置台厦兵备道。在台湾府设台湾、凤山、诸罗三县,府治设于东安坊,在今台南市。这是清政府对内实行治理、对外宣示主权的重要一步。

要让台湾真正稳定,驻军必不可少,为此,清政府在台灣设总兵 1 员,副将 2 员,兵 8000;澎湖设副将 1 员,兵 2000。台湾驻军主要从福建省绿营中抽调,驻扎于台湾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战略等要地,实现对台湾的军事控制。

有了行政、军事人员,就要考虑税收问题。

收复台湾后,处理善后事宜的侍郎苏拜、总督姚启圣想继续按照郑氏的税收名册收税,但施琅认为,郑氏按照一国的用度收税,导致人民负担很重。郑克塽降后,郑氏宗党、文武官员等走了大半,仍按照原有数目收税,无疑会加重人民负担,甚至造成地方动乱。

施琅的上书,又一次引起康熙的重视。

最终,台湾的各项税负均

有不同程度的豁免。在早期治台的官员中,治



▲《康熙南巡图》(局部)(清)王翬 绘

台时间最长、政绩最卓著的,非“治台第一人”陈璘莫属。他做过 3 年台湾县县令,又做了 6 年台厦道道员,之后担任福建巡抚直到去世,其间一直在参与台湾的管理。陈璘为官清廉,当时就被人称为“苦行老僧”“天下第一清官”,康熙皇帝赞为“清廉中之卓绝者”。

除了清廉,陈璘在治理开发台湾上贡献很大。

他明白,治国之本在于“收人心”,收人心的主要办法则是“重教化”。于是,陈璘兴社学、置学田、建文庙、重考核,让台湾的教育事业走上正轨,风俗民情焕然一新。此外,他还“肃官箴”“禁酷刑”“宽民力”“安土番”等,通过这些措施,陈璘成功赢得台湾民众之心,清政府在台灣地区的统治得到维护与巩固。

(摘自《中国国家历史·第 33 期》东方出版社出版 张彦飞/文)

长征中牺牲最多的是炊事员



乏,每人只带了十分有限的干粮,炊事员也没有多余的粮食挑了,终于实现了“轻装”。在这种口粮不足的情况下,许多炊事员还偷偷地把自己的干粮送给了伤病员,确保伤病员饮食不缺、早日养好身体,自己却因饥饿倒在了草地上。

眼看着炊事班的战友一个个倒了下去,其他的炊事员仍没有退缩,而是背起战友身上的行军锅继续行进,并坚决反对以战斗员补充炊事员的提议。正是凭借着这种不畏艰苦、甘于奉献的牺牲精神,红军的战斗力在环境险恶、战斗惨烈、物资匱

乏的长征途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。

长征的胜利,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胜利。“风雨浸衣骨更硬,野菜充饥志越坚;官兵一致同甘苦,革命理想高于天。”据统计,“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,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。”

正是凭借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理想和必胜信念,广大的炊事员才能排除万难,像钟摆一样,烧水做饭、筹措物资、挑伙食担子等,永无休止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

正如红四方面军一个连队的炊事班长所说:“这大锅怎么能丢掉呢?它是我们炊事班为革命战斗的武器呀,就是没有粮食,给同志们烧水煮野菜也离不开锅呀。”这种决不下放革命武器的意识是坚定革命信念的生动体现,支撑着红军战士们走出了草地。

(摘自《新周报》)

古代没人敢当“剩女”

所以,为了能掌握男女的婚恋之事,国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推动举措。首先,国家在各地都设有专门掌管婚嫁之事的官员。周朝时,婚嫁之事是通过官方商量并确定议程的。三国时期,国家将这些“媒官”开设到了一些偏远的边疆地区。到元朝时,政府还会给媒人发放专门的执照。除了机构设施上的完备,在婚嫁年龄上,国家也做了统一的规定。春秋战国时期,越王勾践就曾下令:男子在年满二十岁的时候必须娶媳妇,女子到了十五岁必须嫁做人妇。唐宋时期有了细微的更改,规定男十五岁,女十三岁以上,须婚嫁。明清又改为男十六岁,女十四岁以上应该婚嫁。假

若有人不照做,等待他们的就会是国家的惩罚。

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,有的朝代推出了“单身税”这一税种。唐代,国家对于二十岁却未婚的男性,要进行处罚,对女性的年龄处罚起点则是十五岁。

在古代,如果一个适龄女子没有婚配,那她们要面对的是连自己都无法预知的命运。

先秦时期,假若女子年满二十还未成家,朝廷就会认为此女定是容貌丑陋。三国时期,适婚未嫁的女子很有可能会被拉到军营里当军妓,从此过上遭人唾弃的生活。到了晋朝,如果女子超过二十岁还不嫁人,就会受到残忍的 30 下鞭打。而且随着女子年龄的增长,鞭打次数也是逐年递增。这项规定面前,人人平等,哪怕是一国的公主,也不能免罚。

从汉代开始,国家就定下了这样的规定:凡是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没结婚的女子,

罚 600 钱。600 钱是个什么概念?按照食物来换算的话,600 钱大概可以买 600 斤粮食。这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年的伙食费!在那个生产力不发达,物质贫瘠的年代,能有多少人担得起这 600 钱的惩罚?

到了宋代,婚恋条例对于女性的惩罚更大。《宋书·周郎传》中就有记载:“女子十五不嫁,家人坐之。”意思是,谁家的女儿到了十五岁还没婚嫁,那她的家人也会受到被判刑入狱的连带惩罚!更有甚者,宋代的女性如果到 28 岁还迟迟未出嫁,就会被官府带走进行批评教育。如果女性坚持自己的想法,不听劝,那官员就会直接在她的脸上刺字,从此一生都见不得人!

到了元代,要求更是严苛。如果一个女子三十岁还不结婚,就会被直接拉去寺庙里当尼姑!

在这些严苛的制度下,古代女性没人敢当“剩女”!(摘自《人生与伴侣》XMM/文)

达尔文是哲学家

有一次,我问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,如果给所有的哲学家排座次,你心里的前三名是谁?

他说,前三名我不知道,但是前两名我知道。一个是柏拉图,一个是达尔文。我们通常认为达尔文是生物学家,一共就两个名额,他怎么还让一个其他学科的人挤进来了?

他的解释很有意思。他说,其实人类观察世界,要么是用柏拉图的角度,要么是用达尔文的角度。

柏拉图的角度,就是“理念论”。简单来说,就是万物都是表象,关键在于内部的本质。每张具体的桌子都不一样,那当我们说“桌子”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呢?是那个抽象的、本质的桌子。

我们经常会说“你这个看法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”“你要透过表象看本质”,这就说明,我们是从心底里认同,凡事都要有个本质,都需要一个结论。

这是符合人性的。因为世界太纷乱,知道本质就可以让我们对世界有控制感。这就是柏拉图的角度。

但是,达尔文提出了另外一种观察事物的角度。

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:天底下没有所谓的本质,每种生物都代表了一种真实存在的生物学特性,而且这些特性,既有遗传,还有变异,一直在变化,不要徒劳地做总结。任何东西都在一点点地积累着变化,积累到一定程度,人类只好给它另起一个名字,它就变成了另一个东西。

这是一种有别于“本质主义”的全新世界观:我们身处的世界是复杂多样、不断演化的,一切都有联系,一切也都不一样。达尔文视角的价值在于,理解并且接受这个世界的多样性,以及承认我们就是无法全面掌握它。

任何一个事物摆在我们面前,可能都带有一些标签。我们要做的,就是把标签扒开,然后不断提问。这是件好事,那么请问,它的代价是什么?这是个当时看来不错的方案,那么请问,在长期的运行中,它带来了什么意料之外的结果?等等。

在生命的历程中,我们要的可能不是最终的答案,而是一张“进入更广阔的生活的通行证”。

(摘自《读者》罗振宇/文)

子皋治狱

《韩非子》《孔子家语》《说苑》等文献,记载了“子皋治狱”的故事,大意是:

孔子任卫国的相国,弟子子皋掌管卫国的刑狱,砍掉了一个罪犯的脚,这个人后来做了一个大门的看守。

有人向卫国国君诬陷孔子,说孔子想叛乱。

卫国国君下令捉拿孔子,孔子和他的弟子就逃跑了。当子皋跑到那个大门时,那个被他砍掉脚的人,引导他躲藏在大门边的屋子里,官吏没有抓到子皋。

半夜的时候,子皋问被砍脚的人:“我砍掉了你的脚,现在正是你报仇的时候,为什么你还保护、帮助我呢?”

被砍脚的人说:“我被砍脚是罪有应得。当您给我定罪时,反复推敲法令,很想找到免责的法律依据。您依法给我定了罪,却紧锁眉头、局促不安,流露出了哀怜之情、仁爱之心。这就是我对您感恩的原因。”

(摘自《法治日报》姬黎明/文)